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民国通俗小说
书目资料汇编

魏绍昌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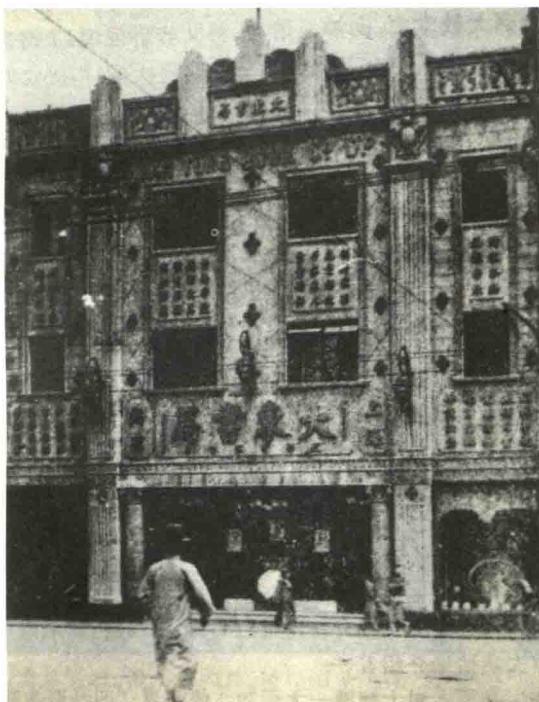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 书目资料汇编

魏绍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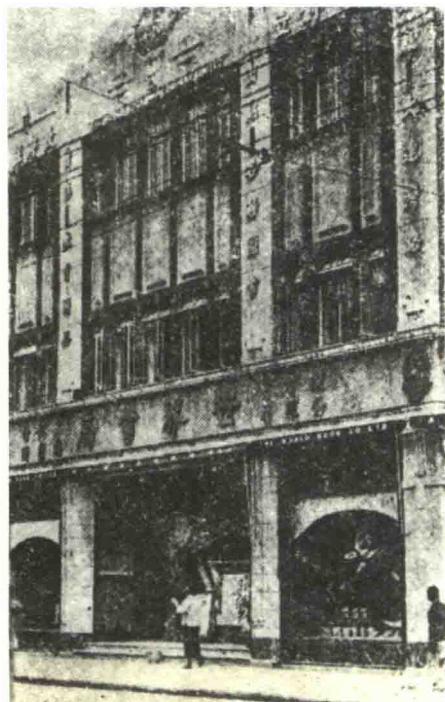
1



一九三〇年代的福州路（近山东路）。据史载：一九三一年大东书局迁入福州路三一〇号（图中宝塔下白色房屋），一九三二年世界书局从福州路三二〇号（图中大东书局左侧）迁移至福州路三九〇号。此图应摄于一九三一年。



大东书局



世界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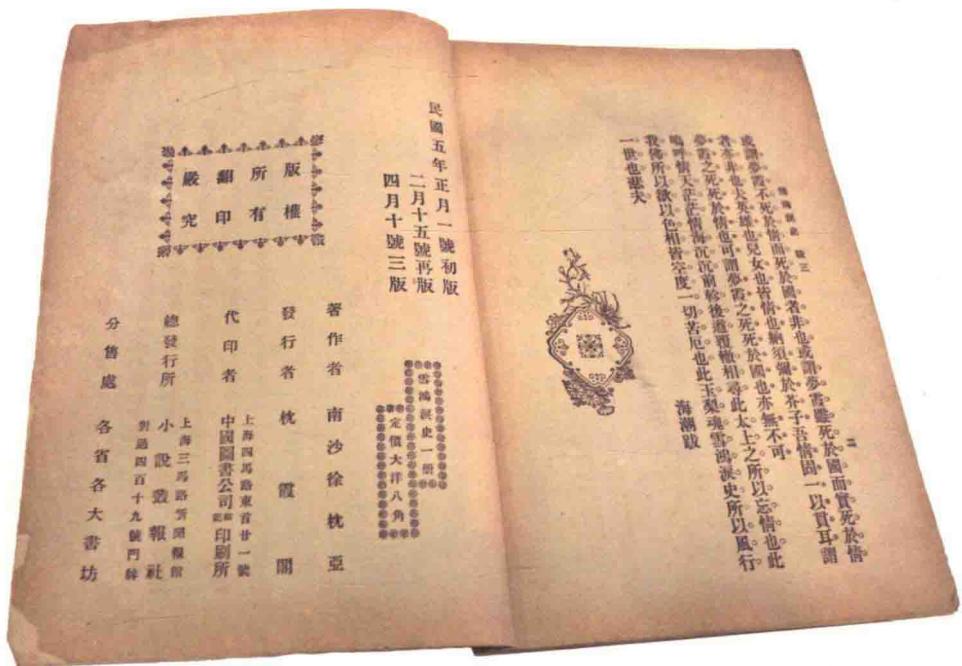
何海鸣

范烟桥

平江不肖生

张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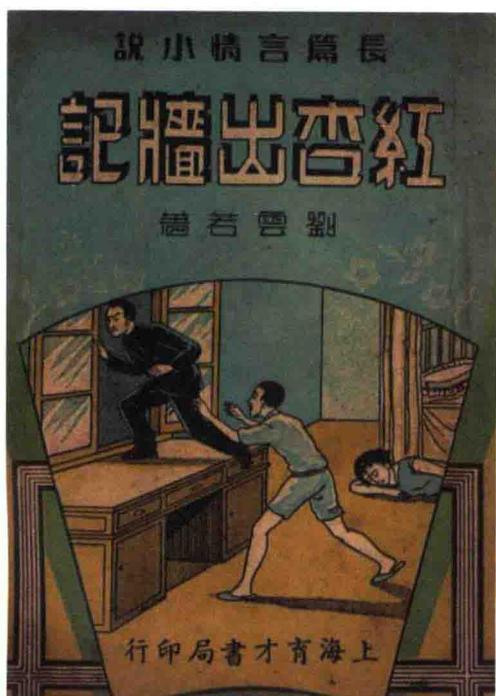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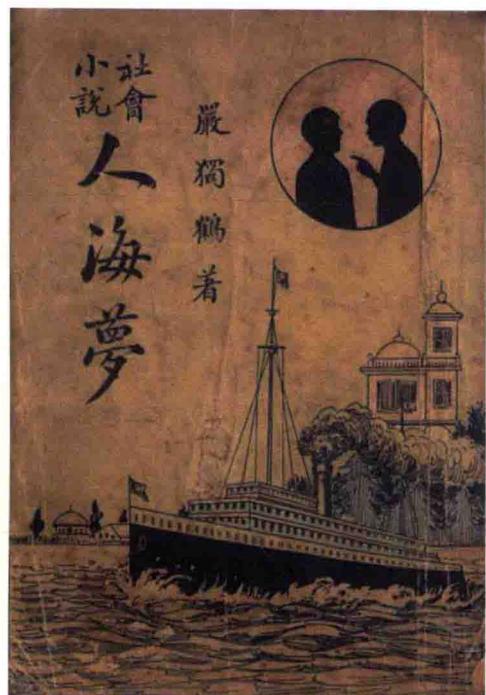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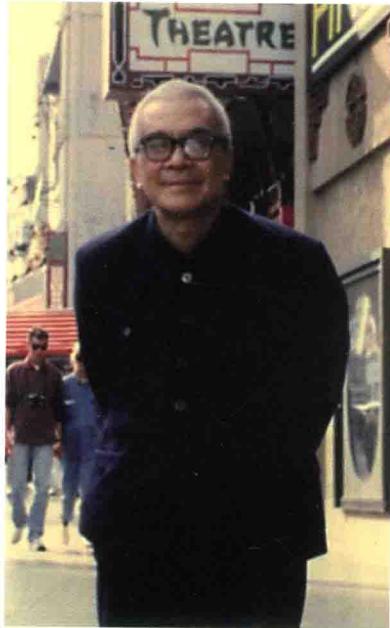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出版的通俗小说



民国时期出版的通俗小说



民国时期出版的通俗小说



主编魏绍昌



《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部分手稿

序

黄 霖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魏绍昌先生组织、编写了这部《民国通俗小说大辞典》)(现改名为《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不能不令人惊叹他的识见与魄力,但在当时我就暗暗担心这部大书能否顺利出版。这种担心倒不是出于这部书规模大,头绪繁,要成书不易,而主要是担心当时上上下下不少人还是带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批小说与小说家的,这是否会使这部书的问世未必一帆风顺呢?

近一个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黑幕小说”、“旧派小说”,乃至“反动逆流”等等帽子长期在这批小说与小说家的头上盘旋着。假如这批小说果真全是或大部分是传播“病菌”式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的话,那么在今天有必要耗去有限的资源去作一网打尽式的搜罗、整理与出版吗?其他人的看法且不说,就以魏先生来说,他在 1984 年出版的一部很下工夫的资料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对这批小说也是习惯地安上了“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其开卷《叙例》第一条就将它们定性为“现代文学史中宣扬趣味主义的一种流派”。用“趣味”两字来概括这一流派的主要特点,应该说是抓到了痒处。但问题是这里的“趣味”前加上了“宣扬”二字,后面又再添上了一个“主义”,显然将这种“趣味”打上了贬义的烙印。接着又说它们“披着‘超政治’的外衣”,“一味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产物”等等,抹上了不少灰暗的色彩。

时过五年,魏先生在《我看鸳鸯蝴蝶派》中,继续说了类似的话,但是与前不同的是,我们看到他在具体分析一些作家作品时,已有诸多的肯定,与一些门面话并不一致。所以,我认为魏先生在对待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问题上,其内心深处一直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充满着感情地去搜集、整理这些曾经被人唾弃的小说与小说家的各种材料并进行潜心研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主流话语

的笼罩下随波逐流，装点了一些套话时语。时至上世纪末，当他考虑编集这部大辞典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他显然已经呼吸到了更多的新鲜的空气，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关键性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再称这批小说与小说家是“鸳鸯蝴蝶派”，而代之以“通俗小说”与“通俗小说家”了。尽管就我个人看来，用“通俗小说”来称呼这批小说也不甚妥帖，这不但与我国传统的“通俗小说”的概念相扞格，又将与民国期间被划出“通俗小说”圈外另贴上或“新”、或“纯”、或“雅”、或“精英”等标签而实际上也是“通俗小说”的一批小说相混淆，且与这批小说中事实上存在着相当数量不“通俗”的作品也不相吻合，但不管怎样，它终究挣脱了一个世纪以来的一条沉重的缰索，用一个还比较倾向于正面的名目来称呼这批小说与小说家了。当然，要彻底抛弃历史的包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在这本资料汇编的评介文字中还是有一些论者沿用着“鸳鸯蝴蝶派”的名目，乃至直到今天的一些著作与论文中还能不时见到有人用“鸳鸯蝴蝶派”来称呼这批小说与小说家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后来的研究者还是越来越多地用“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家”或其他提法来取代“鸳鸯蝴蝶派”了，使研究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是，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魏先生在当初没有留下编选这部大书的“叙例”、“前言”之类的文字，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他当时对于这批小说与小说家的通盘新识。他的识见与宗旨，现在只能通过他编选的其他先生的文字中窥见其一二了。比如，就我看到的样稿中，就窥见一些论者纷纷提出：“时至今日，我们不应不加区别地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作品一概否定，而应实事求是地对他们个人和他们的每部作品作具体分析。”（阿章《奈何天》〔顾明道〕）认为将它们“贬低为消闲文学，以和严肃文学的新文学相对立，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杜梦璞《广陵潮》〔李涵秋〕）指出将“包括严芙孙先生在内的一批言情小说家，一律被冠以含有贬义的所谓‘鸳鸯蝴蝶派’而妄加否定”，“是缺乏具体分析，是极不公正的”（吴泽蕴《严芙孙说集》〔唐铁海〕）。在这种被重新拾起的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中不少论者对这些小说的具体作品与作家作了一些充满着生机的新评价。第一个使我注意到的是贾植芳先生为何海鸣的《老琴师》所作的分析。他说：

这类作品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反映了一些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作为作家，他们只是卖文求墨的文人，而并

非是为虎作伥的官府爪牙；他们的衣食父母是读者大众，即所谓“看官”，而非“帝王家”。他们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人们的消遣品，这也说明了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他们开始摆脱了在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作家对官府的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自己独立人格和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作为平民百姓，也在“生活的地狱”里饱受煎熬之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多少接触到历史事变、时局动态以及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百态。

贾先生对《老琴师》这一具体作品又作了这样极高的评价：

这个故事，虽然取材于色情场所的生活，但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以爱憎分明的生活态度，真实地写出了真实生活中的可怕的真实，以平凡的写实揭露了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这篇短篇小说是平凡的，但也是深刻的，当时曾被旧派小说作家中的名家周瘦鹃推荐为“1922年中国小说界的杰作”，并说它“有永久的流传价值”。这一评语，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参考价值。

这些话，已经一反了过去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看法，基本上从正面来肯定这批小说与小说家了。贾先生的这些话，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经过了理性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不同的是白桦先生作为作家，写下的阅读拂云生《十里莺花梦》之后的具体感悟。这篇文字虽然与贾先生的思维角度、表述方式与流露出来的语气神情等都并不一致，但同样对小说的现实价值作了高度的评价。白桦先生这样说：

《十里莺花梦》写的一些有闲文人和妓女们厮混的生活，使我对中国数千载举步维艰的内在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作者无意留给我们的思路。……这本也许是拂云生信手拈来写出的一本闲书，没有刻意要传世，警世，却引起我一番沉重的感慨来，说明即使是一些父辈或祖辈无意间留下的照片，已经褪色泛黄，我们只要认真看一眼，也会心悸肉颤地感受到一点什么。这大约就是文学和历史的力量吧！

白桦先生说得多好啊，“我们只要认真看一眼，也会心悸肉颤地感受到一点什

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不是自己认真地去看,认真地去思考,认真地去得出结论,而往往是看到一些风云人物登高一呼,即闻风而起,随影而动,于是一顶“鸳鸯蝴蝶派”之类的帽子,你我相传,随风飞舞了近一个世纪。如今到魏先生编集这部大书时,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新的转机。在 51 篇的评介文字中,就不仅仅是贾、白两位先生表露了这样新识,还有一些作者都对有关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如老编审彭新琪论张碧梧的《悲苦之爱》说,“通过这个故事歌颂人类崇高的感情,控诉社会的不公。整个作品贯穿着作者对人性,对传统美德的呼唤,处处流露出作者的真情。作者的伦理观溶化在整个故事描写中,丝毫不影响艺术形象的完整真实,没有一点说教味道,也没有给人一点虚假感。作者以巧妙的构思,层层切入的手法,把读者紧紧抓住。他精心设计了一个个悬念,然后串成一个整体,可以说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文学批评家刘金在论《胡寄尘近作小说集》时也说:“胡寄尘的短篇小说,通过对生活中鳞鳞爪爪的直录,揭示和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畸形的人情世态,有些篇章对吸血鬼给予辛辣的嘲讽与鞭挞,有些篇章流露出热烈的爱国思想和朦胧的‘要改进这社会’的向往。这是同时期的小说(五四新文学小说除外)所不及的。对此,今天我们应当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足够的评价。”事实上,在这些小说中,有的不待评论家们帮它们说好话,去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足够的评价”,广大的读者早已顶着“几多声势浩大的批判”,对它们作出了抉择,这正如徐开垒在论《啼笑因缘》时说的:“几十年后,严峻的历史却无情地向人们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它还活着,还在书市、书场舞台上和影视屏幕中不断出现,这一严酷的事实,向我们继续提出一系列问题,要我们作更多更深的思考。”这些论者的真知灼见,无不表明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中对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与小说家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到 1997 年书稿杀青之时,却正如我前所料:一时竟出版无门。其原由,听说是由于出版者经费告缺。这里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难处在,诸如是否有人会担心对“臭名昭著”了近一个世纪的“鸳鸯蝴蝶派”如是说,算不算“出轨”等等,就不得而知了。时间一晃,近二十年就过去了。这些年来,经过一批研究者的深入研究,拨乱反正与大声疾呼,致使舆论大变。时至今日,不管用什么名目来称呼这批小说与小说家,大都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作具体的分析了,再不会简单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一味去遮蔽、抹黑与否定了。正当此时,这部书稿有望出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假如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相信他会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的了。

这部书稿能得以出版,高兴的恐怕不仅仅是长眠于地下的魏先生,而更应该受到广大近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与研究者的欢迎。正因为一大批这类小说曾经被另眼相看,长期处于被禁、被毁或半禁、半毁的状态之中,不要说留在一般读者脑海里只是一片空白,就是对专门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也很少能知其大概。如今在魏先生等人的努力下,梳理出了 2000 多部小说,经分类后,从书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月、字数,到章节、回目等,一一加以交待清楚,这不但使我们清楚了民国时期这一大批小说的家底,而且使我们了解了 2000 多种小说的大致内容与基本情况,极大地开阔了近现代小说阅读与研究的视野。不但如此,魏先生还精心挑选了 51 篇作品,请一些小说研究与小说创作的行家里手逐篇评介。这 20 余万字的评介文字,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色调,对相当部分早被人们遗忘了的一时名作作了细致的解剖,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与改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小说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先生所编的这部大书真是功德无量。

当然,此书由于编写人员有限,又受到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还没有当今编辑书目之利器——网络与数据库,所以难免有一些疏漏。一、如书目漏载。如陆士谔的小说仅著录 21 篇,实际上他的通俗小说恐有 90 余种之多(有的已佚)。再如胡寄尘名下著录了他编集的《家庭小说集》,其实他还编有“侠情”、“哀情”、“言情”、“奇情”、“侦探”、“冒险”、“科学”、“军事”、“外交”、“历史”、“爱国”、“道德”、“伦理”、“教育”、“政治”、“神怪”、“滑稽”、“警世”、“社会”等多种小说集,“家庭”仅是其中一种。除了编集的小说之外,他的多篇创作小说也漏载了。今天假如上网查一查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的书目,一下子就可以增加不少的篇目了。二、如著录有误。如有的因不明作者的字号而将一人分列在两处,如“践卓翁”本是林纾的号,《平报》曾为他开设了“践卓翁短篇小说”专栏,后结集印成《践卓翁短篇小说》三辑,似因胡适批评它不像小说而后改名为《畏庐漫录》。今将践卓翁与林纾分列在两处,当两人来处理,就不太妥当了。甚至有的将不是民国时期的作者也列入其中,如明末清初的烟水散人及其《女才子》等就是。^① 产生这些疏误,对于这样一部大书来

^① 编者注:本书编辑初期,黄霖先生曾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错漏,编辑根据其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与订正。再次向黄霖先生表示感谢。

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总的来说,这些微瑕完全不能掩盖其煌煌功绩。这部大书毕竟能以丰富而详实的资料,新锐而独到的见解去引导人们认知曾经被长期遮蔽、歪曲、否定的半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它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近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走向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一个新阶段。

2014 年 5 月 22 日

凡 例

一、《民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汇编》是著名文史学家魏绍昌(1922—2000)主编的大型资料文献。全书依据篇幅体量,以三分册形式推出。

二、本书的编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如实而全面地反映民国通俗小说的创作结集、出版状况;力求使之成为条目完备、内容翔实、编排科学、检索方便的工具书,供专业工作者、图书资料部门和广大读者使用。

三、本书辑录民国时期出版的通俗小说近 2000 种。按著译编者的首字笔画为序编排,并尽可能以常用名归并同一著译者的多种笔名。多人合集以第一作者、译者或编者设立条目,合作者在书目中予以著录。翻译文学书目辑入译者名下。同一著译编者名下的作品,按笔画为序编排。

四、书目资料收录时限,原则上以 1912 年 1 月 1 日为上限,1949 年 9 月 30 日为下限,但根据出书的实际情况,略有上下延伸。

五、每条书目依次编写下述内容:书名,类型,丛书名、异名,著者、译者、编者署名,出版状况,篇幅,题词、序跋情况,章回数,目次等。书名之后另起行,接排条目释文。版本描述之后另起行,分栏记录章回信息。

1. 书名作为条目词头,用三号宋体字表示。书名均按原书题名著录。

凡同书异名者,一般在书目中以“即……”注明异名;属于后来改书名再版的,则另立条目。

2. 著译编者名按常用名著录;凡是原书署名非常用名的,则加圆括号置于常用名之后。多人合集,除了按版权页署名著录的,其余则据书中第一篇作品的作者署名著录。

3. 出版状况依据版权页著录下列内容:该书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和版次等。版次以编者所见的最早版本为准,用“初版”、“再版”等加以区别。

4. 目次著录该书所收作品篇目、章回和分辑情况,依据该书目录编写。题词、序跋、插图等,均在书目条目中说明。无细目者,略作说明。

5. 章回名目中因原书印刷不清或残缺不全的文字,用“□”代替;整个章回名目佚失的,用“(缺)”标明。

六、书前共有插页6页,收录反映民国书业状况、作家面貌、图书样态,以及本书创编人员和工作情况的图片17幅,藉以存真和纪念。

七、书后附有51篇文学研究专家和当代著名作家有关民国通俗小说的评介赏析文章,便于读者了解20世纪90年代本书创编时期对于民国通俗小说的理解程度和研究水准。文中插入了相应的作者肖像、手迹、书影等,以增强史料性和可读性。

八、本书编制了《书目笔画索引》,以便检索。索引以书名字头的笔画笔顺为序排列。书名相同而实不同书者,注明著译者,以示区别。

九、本书基本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个别人名例外处理。对于反映了民国时期现代汉语、方言俗语中古今嬗变、雅俗共存等特征的字形、语汇,予以适当保留,以资研究备览。

民国通俗小说书目